

# 文化外交的学理分析与实践路径

## ——“文明对话论”的视角

杨悦

(外交学院 亚洲研究所, 北京 100037)

**内容摘要:** 作为文化外交的最早实践者, 西方国家形成了以西方文明中心论和国家利益观为出发点和目标的文化外交理论和实践路径。实践证明, 西方国家实施的文化外交不但会造成文化和文明间关系的持续紧张, 还会导致文明间的恶性竞争和冲突。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化外交对人类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本文从“文明对话论”的视角, 为文化外交的学理分析和实践路径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范式。文化外交应将“文明对话论”核心思想纳入文化外交决策和实践的全过程, 以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相互统一为出发点, 采用“核心价值—文明自觉—共同价值”的文明对话模式, 实现文明自觉和全球文化认同的同时构建基于多元多维文明共存的和平的世界秩序。在实践层面, 注重内外统筹, 对内深挖文化的优秀思想, 特别是挖掘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思想, 提升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为文明间平等对话奠定基础, 将“文明对话论”思想纳入国家教育体系, 深植“文明对话论”的社会土壤; 对外一方面可借助联合国的天然合作平台, 深化与联合国文明联盟的合作, 也可利用主场外交, 以开放包容的姿态, 积极搭建文明对话平台, 协同培育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文化认同。

**关键词:** 文化外交; 文明对话论; 国家利益; 文明观

**DOI:** 10.13885/j.issn.1000-2804.2021.05.008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 (2021) 05-0074-09

20世纪20年代, 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率先将文化作为外交手段, 对外输出文化、思想与价值观<sup>[1-2]</sup>。此后,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文化引入国家的对外政策, 通过外交途径推介自身文化, 促进对外文化交往, 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为国家整体利益和外交服务。从西方国家文化外交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看, 文化外交政策是基于西方的文明观和国家利益观制定的, 本质上是西方国家对外推广西方式民主的工具, 西方学者为实现这一目标构建了一整套理论和话语体系。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了“软实力”概念, 文化被政治化和具有排他性、利己性的西方国家利益观驱动的趋势愈加强化, 通过对文化的推介造成文化和文明间的竞争和冲突的态势在增强。西方国家的文化外交带有鲜明的西方文明底色。西方文明具有使命性特征, 其使命是要全世界都接受西方文明, 全世界的经济体系都成为西方市场经济, 世界各国都采用西方式民主体制<sup>[3]</sup><sup>26</sup>, 采用的是“普世价值—文明转型”的文明对话模式<sup>[4]</sup>。长期受到西方理论和实践影响的文化外交存在定位不明和概念不清的问题。西方国家的文化外交政策目标不但寻求软实力提升和国家形象改善, 还要将西方文明强

**收稿日期:** 2020-06-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16ZZD029); 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3162015ZYLL07)

**作者简介:** 杨悦(1976-), 女, 吉林四平人, 博士, 副教授, 从事文化外交、美国政治与外交、东亚地区安全。

加给其他文明。这就为文化外交研究与实践者，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和决策者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化外交的定位问题，将文化作为外交手段究竟要实现怎样的国家利益，进而要规划怎样的实践路径？这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本文试从“文明对话论”的视角，对文化外交的学理分析和实践提供一个有别于西方范式的新的思考路径，以期文化外交能够在文化和文明层面发挥更加积极的基础性作用，在维护各国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使全世界普遍受益。

## 一、“文明对话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反西方文明中心论思想是贯穿“文明对话论”提出与发展的主线。“文明对话”一词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sup>[5]</sup>。

1977年，罗杰·加罗迪（Roger Garaudy）著述的《文明之间的对话》一书出版，书中提到他创造的“文明对话”一词，对西方文明的利己主义进行批判，指出西方是在文明中形成“自我主义”的罪魁祸首，而在其他文明中出现的“自我主义”则是对“西方自我主义”的反命题。加罗迪认为，只有当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之时，真正的对话才会发生。只有所有人都深信别人是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同文明间才能有真正的对话<sup>[5]34-35</sup>。加罗迪建立了推动文明对话的国际机构，还试图推动一个世界和平中心的项目。然而，由于加罗迪的观点主要是对西方的尖锐批判，并且他的主张在当时也仅限于宗教领域，因此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第二个阶段是以冷战结束为起点的。两极世界秩序的终结引发了学界对后冷战时期世界秩序的辩论，“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继续称霸世界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使“文明对话论”作为一个反命题从宗教界扩展到国际政治领域。“文明对话论”首次作为学术话语出现在杜维明的著述中。20世纪90年代初，杜维明提出发展文明对话研究，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前后出版了25本论文集<sup>[6]</sup>。他指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将世界分为西方和非西方的假设是错误的，在21世纪乃至22世纪出现一种文明一枝独秀的机会不大，必须承认世界多元文化的事实<sup>[7]126</sup>。他也特别倡导现代儒学要参与到文明对话当中。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政要也纷纷倡导文明对话。1994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天涯成比邻》报告，呼吁建立新的对话文明。1995年5月，第二次“锡纳亚对话”在罗马尼亚举行，推动文明对话<sup>[8]</sup>。1995年秋，被誉为“文明对话建筑师”的伊朗前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Seyyed Mohammad Khatami）首次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倡导文明对话，认为“文明对话论”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新范式，指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成就”应包括：“接受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拒绝武力”；人类文明的提升“都是以不同社会间和不同文明间对话为条件的”；文明对话应该制度化，以对话和理解代替敌视和冲突<sup>[9]</sup>。“文明对话论”成为全球政治话语首次出现在1997年哈塔米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是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互不容忍的角度进行阐释的。1998年9月哈塔米在联大发言中建议将2001年定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同年，联合国正式将“文明对话”写入正式议程。哈塔米在全球政治层面提出“文明对话论”是反对美国强权政治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表现。正如他所提到的，美国外交政策要放弃工具理性的做法，停止将他者视为敌人，应当尊重他者的权利并采用基于交际理性的外交方法<sup>[10]</sup>。

第三个阶段为“9·11”事件发生至今。“9·11”事件使国际社会意识到世界政治中普遍存在的和谐的严重性，进而使“文明对话论”更加突显其现实意义，也加速推动了文明对话作为国际议程的发展。2001年11月9日，第56届联大通过了由中国等75个国家共同起草的《促进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包含“促进文明对话的全球议程”“目标、原则、参与者”和“行动计划”三个部分，为文明对

话提供了指导思想和行动框架<sup>[11]</sup>。至此,联合国已成为文明对话的重要推动者<sup>[12]</sup>。2005年联合国成立联合国文明联盟,堪称文明对话的国际组织者。200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为文明对话奠定了法律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推动文明对话议程的核心机构,通过与成员的合作,形成具有全球影响的宣言和公约,如《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与《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等,推动文明对话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有关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非西方文明能否替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中国能否为人类提供另一个文明选择的探讨也在日益升温<sup>[13]</sup>。事实上,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都不是以替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文明为目标的,相反,中国通过在国际舞台积极发声、参与联合国文明联盟各类活动以及搭建文明对话平台,为“文明对话论”注入了中国理念。2014年3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阐释了中国的文明对话观,提出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的重要理念,以及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的“多彩、平等、包容”三点原则<sup>[14]</sup>。中国的文明对话理念带有鲜明的中华文明基因。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的思想体系<sup>[15]</sup>。无论是作为治理哲学还是作为个体层面的生活方式,儒学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sup>[3]36-38</sup>。

## 二、“文明对话论”思想的核心要义

“文明对话论”以对话的方式处理各文明间的关系,建立基于多元多维文明和平共存的新世界秩序。综合学界和官方倡导的“文明对话论”思想,本节将从文明对话原则、文明对话模式、参与者及领域、目的四个方面对“文明对话论”的核心要义加以阐释。

### (一) 文明对话的原则

原则关乎到文明对话能否实现,究其根本关乎到各文明共存的问题。

1. 树立多元多维的文明观。尊重世界文明是多元多维的,即使在一个文明内部也存在多元传统。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提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文明,不同文明不仅造就了不同的国家制度,而且也具有了不同的世界秩序观”<sup>[16]</sup>。卡赞斯坦认为西方文明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具有多重传统,内部具有多元性的<sup>[17]</sup>。习近平曾指出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sup>[18]</sup>。

2. 尊重文明共性与差异。杜维明认为,各文明之间在基本价值观、人性和共同道德感情等方面存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正是文明对话得以实现的可靠依据<sup>[19]</sup>。很多学者也认为各文明皆具一些普世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性内容的不仅是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等其他文明同样具有普世性要素。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固然有些标准来自西方,但并不证明西方文明可以取代一切。各文明间存在差异是客观存在,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存在的依据<sup>[20]</sup>。文明差异不是文明冲突的根源,文明冲突的根源在于对待文明的态度<sup>[21]</sup>。

3. 坚持文明对话推动各文明的完善与进步。人类文明史是一部异质文明交流的历史。明末清初以来的两次“西学东渐”,掀起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中西知识汇通<sup>[22]</sup>。东亚国家是热心研究西学的典范,积极参与按照西方模式进行自我改造,这在人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东亚国家华人的经济文化、家庭价值观和经商伦理仍然保留了儒学的根基<sup>[23]319-322</sup>。文明对话不会破坏文明的核心价值,相反通过对话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推动各文明的自觉和进步。

### (二) 文明对话的模式

文明交往的模式多种多样,有冲突式、融合式、教化式等。然而冷战结束后,“普世价值—文明

转型”的对话模式很快盛行起来。“历史终结论”就在倡导此种模式，认为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意义，其他文明终将被西方文明所取代。亨廷顿则表现出了对“普世价值—文明转型”对话模式的现实焦虑，认为“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战争；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sup>[24]359</sup>。谢文郁认为，苏联解体之后，受强势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世界各文明间的对话变得极为简单，即宣传并推动世界各文明采纳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促使其他文明转型，最终实现一个拥有普世价值的大同世界。谢文郁从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宗教对话和第二轴心时代的跨文化对话理论论证了“普世价值—文明转型”对话模式在实践上终将陷入困境<sup>[4]</sup>。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一种文明排斥其他文明，试图将一种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的情况，但都以失败告终。谢文郁基于对文明所具有的原始责任意识、视角盲点和普世主义倾向等基本特性的分析，提出文明对话的“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即“建立文明对话平台，突出各文明的平等尊严，彼此帮助消除对方的视角盲点，推动并深化各文明对自身核心价值的认识，导向一种和而不同的诸文明共存的和谐世界”<sup>[4]20</sup>。哈塔米也认为各文明通过与他者交流的过程是自我发现、自我完善的过程<sup>[25]</sup>。通过文明交流推动人类进步是“文明对话论”倡导者的共同认知，这也符合“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文明对话模式的内在逻辑。

### （三）文明对话的参与者及领域

“文明对话论”思想中探讨的参与者主要指文明对话的推动者。哈塔米认为文明对话的推动者是思想家、艺术家、学者、作家和诗人而不是政治家<sup>[26]</sup>。杜维明提出，处在不同文明中的群体和个体在推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所具备的力量是不均衡的，掌握资源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越应该推动文明对话，对人类文明做出与其能力匹配的贡献<sup>[6]9</sup>。“文明对话论”的最初推动者们主要通过对话解决伊斯兰和西方文明的问题。然而，随着全球化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各文明的孤立发展已属罕见，目前全球化的对话网络已经建立，为个体参与到文明对话中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更多的平台。动员个体的参与有利于提升不同文明的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文明观，为文明对话的开展奠定广泛的民众基础。文明对话也不能将政治家排除在外。政治家相较于普通民众享有更多的社会、国家和国际资源，他们理应成为推动文明对话实现的重要力量。宋健指出，“文明的载体主要是民族国家，各个国家应在倡导不同文明间开展对话中负主要责任”<sup>[27]</sup>。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是文明对话的重要推动者。文明对话发生的领域，客观上讲是发生在不同文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然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思想、价值观领域应该成为文明对话的优先领域。文明冲突的发生正是因为触及了各个文明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恰恰是来自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思想、价值观领域，而不是文学、艺术、音乐等文化创造或是饮食起居等生活习惯方面<sup>[22]</sup>。

### （四）文明对话的目的

1. 从发展层面看，促进可持续发展。2015年，文化首次出现在联合国采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此举称为对文化的空前重视。文化和文明塑造社会和国家身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和实现过程中考量不同文化和文明的特点，才能确保实现以人为本，包容且公平的发展目标。联合国《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四海皆准的发展模式，必须制定符合不同文化的本土化的发展目标，才能大大提高援助的有效性<sup>[28]</sup>。文明对话正是为了增进文明间的了解，将可持续发展置于不同文化和文明背景之中，提升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不同文化和文明的社会与国家中的可适度。

2. 从价值观层面看，培育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就是因为存在着所有成员都能理解和接受的价值体系。人类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助于凝聚共识，携手解决共同面临的各种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0年国际文化和睦年发布的报告中提出培育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目标，如自由、平等、团结、容忍、尊重自然、共负责任、同理心、尊重

文化多样性。以此为目标的文明对话模式应将“核心价值—文明自觉”的模式升级为“核心价值—文明自觉—共同价值”的对话模式,即通过具有各自核心价值的文明间对话,既能推动文明自身的完善,也有助于培育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从而实现文明间的和谐共存。

3.从国际关系层面看,建立基于多元多维文明共存的和平的世界秩序。法比奥·佩蒂托(Fabio Petito)认为,哈塔米提倡的“文明对话论”的哲学本质就是在东西文明、现代性和传统性、物质和精神之间寻求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追求一致,而是寻求文明的和而不同。文明对话的目标是反对强权、铲除暴力、预防冲突,为人类创造力的蓬勃发展提供基础<sup>[29]</sup>。“文明对话论”的终极目标是文明间的和平相处,进而实现世界的和而不同。

### 三、“文明对话论”对文化外交研究与实践的启示

文明对话不能仅停留在纯粹的学术层面,更应成为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必由路径。具体到国家层面,各国应制定推动文明对话的相应战略和政策。各国文化外交的核心内容本应是增进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然而由于文化外交的研究与实践长期受到以英法美为代表的早期文化外交实践者的影响,因此从实践情况看并未达到文明间相互包容与和平相处的效果。究其原因,西方国家制定和执行的文化外交具有明显的文化霸权主义色彩。西方国家以文化作为外交手段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文化外交活动在非西方国家推广所谓具有普世价值的西方文明,进而实现改造其他文明的目的。西方所标榜的以软实力竞争和维护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文化外交不但与人们希望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尊重和了解的愿景背道而驰,更会导致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关系持续紧张,进而导致文化和文明间的恶性竞争,甚至造成文明间的冲突<sup>[30-31]</sup>。跳出西方主导的文化外交研究范式和实践路径需要借鉴“文明对话论”的核心思想。“文明对话论”是作为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命题提出的。遵循多元多维文明观、尊重文明共性和差异以及文明对话推动各文明完善和进步的原则,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培育人类共同价值观和建立基于多元多维文明共存的和平的世界秩序为目标的“文明对话论”思想不但能为文化外交提供一个新的学理分析范式,也可以为文化外交的实践提供启示。

#### (一)超越国家利益的文化外交学理分析范式

国家利益最早是由西方学界提出的,是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础。维护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天然使命。然而学界对于国家利益内涵的界定以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关系认识上仍然存在分歧。西方学者是基于西方的固有思维和历史经验提出的西方国家利益观。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民族主义精神一旦在民族国家内得以实现,它就被证明是完全忠于一国利益的和排他的,而不是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的”<sup>[32]76</sup>。基辛格也在评价美国外交政策时讲到,不谋私利的国家政策是不可靠的,应将建立世界秩序的目标同美国国家利益联系起来<sup>[33]610</sup>。西方学者和政客是基于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冲突思维看待国家利益的。西方国家的文化外交政策也是基于这种冲突思维制定的。西方国家本质上希望通过文化外交强迫非西方国家认可西方文明才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普世意义的文明,进而强迫其他文明按照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改造自己。而“文明对话论”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冲突思维的新的思考方式。近些年,中国在阐释国家利益内涵以及处理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关系方面提出了中国理念,即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合作理念的指导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这一理念与“文明对话论”在处理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处理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国家间关系方面提出了基于统一合作而非冲突的原则。以统一合作思维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文化外交是能够超越国家利益的。超越国家利益并不意味着牺牲自身利益,而是使决策者意识到对外政策在文化和文明层面能够超越国家本身,把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统一起来,即通过文明对话构建基于多元多维文明共存的和平的世界秩序是符合各国国家利益的。丧失了文明间的和平相处,丧失了和平的世界秩

序，各国的国家利益也无从谈起。基于将国家利益视为国际利益对立面的西方思维将使自身的利益受损。基于上述分析，文化外交要实现的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提升就意味着通过文化和文明间的对话，相互借鉴，实现自身文化和文明的完善与进步，进而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也是与国际利益高度统一的，即在保护好各自文明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多元多维文明共存的和平的世界秩序。

这对于今天强权政治仍占上风、民粹主义回潮的现实世界恐怕太理想化了。然而，文明对话早已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知识界和政界人士的大力倡导和推动，在国际层面还得到了联合国的助力，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意识到对话和合作的必要性，理性的呼声和行动也应该越来越强、越来越多。文化外交研究者和决策者对于文化外交超越国家利益的意识归根结底要对文明的特性和文明对话的本质有正确的认知。文明作为客观存在是没有道德价值判断的，因此要避免文明间的比较。比较会产生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扩大自身文明的优势，突出他者的劣势；二是对自身文明不满，希望进行改革，而夸大他者的优势，贬低自己。文明的共性和差异也是客观存在，是文化外交研究者和决策者必须正视和接受的。资中筠曾以“平等”为例说明文明的差异问题。人权观念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较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较为注重个人的平等权利，而种族平等的观念却较为落后。现代化的后来者则更加重视对种族和民族的平等。但是不能以此得出结论，种族歧视就是西方文明的特点，而蔑视个人权利则是弱势国家文明的特点。无论是个人权利还是种族平等都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只不过由于历史发展速度的不同导致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有所不同<sup>[22]</sup>。

文化外交的研究者和决策者还应充分认识到，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维护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目前，各文明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仍然很不均衡，因此在文化和文明层面维护国家利益仍具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各文明保持开放的同时，避免在与所谓的强势文明对话的过程中被其同化和侵蚀，应通过文明对话推动文明自觉，实现自我完善，树立文明自信。理论上讲，文明间本不存在强势和弱势，只有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进而导致不同文明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的强弱不均。每个文明都是自成体系的一个独立存在。之所以在人们印象中会产生强势文明，原因在于前文提到的“普世价值—文化转型”的文明对话模式。所谓的强势文明不但对自身文明盲目地自信，也由于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领跑者，因此使其在与其他文明对话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sup>[34]</sup>。如何避免“普世价值—文化转型”对话模式，所谓的强势和弱势文明都要做出理念上的调整。强势文明要树立正确的文明观。每个文明都存在自身的视角盲点，如果在对话中不愿倾听、拒绝发现其他文明的优点，自身也失去了反思的基础，会陷入一种自我封闭、固步自封的局面。而弱势文明则要树立自信，在与强者对话时敢于争取话语权，对强势文明既不要全盘否定也不要全盘接受，借鉴其优良，扫除自身的盲点，实现文明自觉。各文明应在互相尊重其核心价值观的原则下开展对话，通过对话在完善自身的同时培育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进而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 （二）培育全球文化认同的文化外交实践路径

文化外交实践不能止于文化和文明的自觉及其国际认可度的提升，而应以培育全球文化认同作为终极目标，并以此规划实践路径。全球文化认同包含两方面内容，即文化理解和文化共识<sup>[35][36]</sup>。在文化理解层面，应承认两个事实，一是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即不同的民族、种族和国家都具有某些相同的价值观念。另一个事实是人类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有些差异在短时间内无法融合，但不同文化要相互理解和尊重。文化外交实践不能寻求以自己的文化价值去衡量其他文化，不能基于自己的文化认同去判断其他文化，更不能寻求用自己的文化去取代其他文化，要避免滑向文化霸权主义。在文化共识层面，应培育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文化共识。培育全球文化共识是人类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关键，也应是指导文化外交实践的重要原则。

文化外交需要从国内外两个层面规划培育全球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加强内外统筹。对内深挖自

身文化和文明的优秀思想,一方面做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会贯通,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此提升国内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另一方面挖掘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和文明思想,为文明平等对话以及在对话中提升话语权奠定基础。对内还要将“文明对话论”思想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加强对民众的相关教育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深植“文明对话论”的社会土壤,推动民众树立正确的文明观以及普及正确的文明对话模式。从人类诞生以来,多元文明从来就是共存的,找不到一个只存在一种文明的时期,也就是说从来就不会有“历史的终结”这一天。

对外借助联合国开展文明对话。与联合国合作应成为各国文化外交实践的重要路径选择。文明对话在21世纪初已经成为联合国的正式议题。联合国文明联盟是推动文明对话的专门组织,通过与成员联合举办年度论坛以及打造推动文明对话的旗舰项目、支持成员在国家层面制定文明对话政策、支持区域组织制定文明对话战略、支持保护文明多样性的创新计划等方式推动文明对话。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是各国实践文化外交和携手推动文明对话的天然平台。借助联合国有利于拉近所谓强势文明和弱势文明的距离,有助于提升所谓弱势文明的自信和话语权。以中国为例,中国派代表参加联合国文明联盟名人小组,参与推动文明对话议程相关的报告撰写,承办联合国文明联盟组织的全球年度论坛,并参加了联合国文明联盟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全球年度论坛,承办联合国文明联盟首次在东亚地区组织的地区性会议<sup>[36][73]</sup>。中国参与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进程表明各国有多种途径参与到联合国的文明对话议程当中来,既可以通过联合国推介自己及其地区的文化和文明,也可以倾听和了解其他文明。各国还可利用主场外交,搭建文明对话平台,如2019年中国举办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推广正确的文明观以及文明对话模式,在地区和世界层面推动培育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文化认同。

#### 四、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依存度也随之加深,同时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也不断增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各国更加意识到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培育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文化认同是各国能否开展合作的关键,也是关乎世界和平稳定的核心因素。文明对话是培育全球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推动文明对话须落实到国家层面。然而文化外交在研究和实践层面都深受西方文明观、国家利益观及其文化外交实践的影响,仍然存在概念和路径模糊的问题,文化被政治化和具有排他性、利己性的西方国家利益观驱动的倾向也在被强化。为了跳出西方主导的固有思维路径,文化外交无论是在学理分析还是在政策实践上都需要与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文明观和西方具有排他性、利己性的国家利益观划清界限,将“文明对话论”核心思想纳入文化外交政策制定和实践的全过程,以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相互统一为出发点,采用“核心价值—文明自觉—共同价值”的文明对话模式,进而实现文明自觉、全球文化认同和基于多元多维文明共存的和平的世界秩序的构建。这样既能够维护国家利益也有助于化解世界困境,使全人类受益。

#### 参考文献

- [1] Arndt R T. First Resort of Kings: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hington D. C.: Potomac Books, 2007: 5, 60.
- [2] Rivera T. Distinguishing Cultural Relations from Cultural Diplomacy: The British Council's Relationship with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Los Angeles: Figueroa Press, 2015: 5.
- [3] 郑永年. 中国崛起: 重估亚洲价值观.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

- [4] 谢文郁. 文明对话模式之争: 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 文史哲, 2013 (1): 15-21.
- [5] Zaidin M, Yusof S, Salleh A Z, Hisham A.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ation and Social Studies*, 2017(2): 34-39.
- [6] 杜维明, 杨学功. 文明对话: 背景·旨趣·路径. 寻根, 2003 (2): 4-14.
- [7] 杜维明. 全球化和文明对话. 开放时代, 2002 (1): 123-131.
- [8] Shen Qurong.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ocumentary Annex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2002: 21-34.
- [9] Khatami M. Statement by Presid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Before the 53r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1998-09-21]. [http://www.parstimes.com/history/khatami\\_speech\\_un.html](http://www.parstimes.com/history/khatami_speech_un.html).
- [10] Khatami M. Interview by Christian Amanpour. [2021-03-15]. <http://edition.cnn.com/WORLD/9801/07/iran/interview.html>.
- [11] Global Agenda for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 The General Assembly, 2001.
- [12] 杨濡嘉. 联合国与文明对话: 角色和趋势. 复旦: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3] 郑永年. 中国的文明复兴.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8.
- [14] 习近平.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2014-03-28].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3/28/c\\_119982831.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3/28/c_119982831.htm).
- [15] 习近平. 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9-05-1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5/15/c\\_1124497022.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5/15/c_1124497022.htm).
- [16] Kissinger H. *World Order: 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4.
- [17] (美) 彼得·J·卡赞斯坦, 主编. 英美文明与其不满者: 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身份. 魏玲, 王振玲, 刘伟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18] 习近平.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求是, 2019 (9).
- [19] 林锋. 文明对话新论.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8 (6).
- [20] 张西平. 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 对四百年中西文化交流的检讨. 光明日报, 2001-09-18 (3).
- [21] 资中筠. 文明对话与国际关系. 人民日报, 2001-09-21 (7).
- [22] 郑云艳. 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三种知识汇通模式.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9 (4): 121-128.
- [23] (美) 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 文化的重要作用: 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程克雄,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 [24]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 刘菲, 张立平, 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 [25] Pantham T. Some Dimensions of Universality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 Conversation with Hans-Georg Gadamer. *Journal of Indian Counci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1991(9): 132.
- [26] 白志所. 哈塔米的文明对话思想. 回族研究, 2005 (3): 17-20.
- [27] 宋健. 文明对话: 世界的共同追求. 人民日报, 2001-09-21 (7).
- [28]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Report. Global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Cul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4-07-31]. [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CLT/pdf/2-UNSG\\_Report\\_A\\_69\\_216\\_EN.pdf](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CLT/pdf/2-UNSG_Report_A_69_216_EN.pdf).
- [29] Petito F. Khatami's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a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Journal Humanities*, 2004(11): 11-29.
- [30] Aronczyk M. *Branding the 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31] Ang I, Isar Y R, Mar P. Cultural Diplomacy: beyo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15(21): 365-381.
- [32] Morgenthau H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8.
- [33] Kissinger H. The Central Issu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ermit Gordon, ed. *Agenda for the Natio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68.
- [34] 谢文郁. 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如何对话. 光明日报, 2015-04-16 (16).
- [35] 郑晓云. 文化认同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36] 张贵洪, 郭峰毓. 联合国与文明对话.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3.

##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Cultural Diplomacy: A Perspective of the “Civilization Dialogue Theory”

YANG Yue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As the earliest practitioners of cultural diplomacy,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formed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cultural diplomacy with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centralism and self-interested national interes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goal. The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cultural diplomacy implement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not only causes lasting tension between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but also leads to vicious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order to better utilize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cultural diplomacy in huma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new thinking paradigm to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cultural diplom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vilization dialogue theory”. Cultural diplomacy should incorporate the core ideology of the theory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cultural diplomacy decision-making and practice, take the mutual unity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dopt the dialogue mode of “core values-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common values”, and build a peaceful world order based on the coexistence of diverse and multidimensional civilizations while realizing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and global cultural identity. In practice, cultural diplomacy should lay emphasis o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factors. At home, it should explore fine cultural thoughts, especially those with global significance, enhanc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o underlie a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on an equal footing, and incorporate the thought of “civilization dialogue theory” in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make it deeply rooted in society. In foreign relations, it can deepe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 with the help of the natural cooperation platform United Nations or utilize ‘host diplomacy’ with an open and inclusive attitude to actively build a dialogue platform for civilizations and jointly cultivate global cultural identity with mutual respect,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win-win cooperation at its core.

**Keywords:** cultural diplomacy; civilization dialogue theory; national interest; civilization view

(责任编辑:寇 甲)